



第六章

变化中的农村生活状况

饥荒和粮食危机暴露了民不聊生的危险境况。2002年，南部非洲的几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粮荒，影响范围非常广，总共有1 400万人挣扎在饥饿和困苦之中。直接的起因是旱灾和局部严重水灾，但是由于许多家庭此前已经饱受粮荒之苦，致使灾情更加深重。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肆虐进一步加剧了资产和社会支持网络的瓦解。20多年来，经济自由化的冲击削弱了小农营造可行生计的能力，从而加深了农村的贫困。¹

大约在同一时期，印度发生了许多棉农因债台高筑而绝望自杀的事件。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由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棉价上涨，加之官方鼓励，许多农民纷纷将种植粮食作物的农田改为种植棉花，特别是在安得拉邦、北部的卡纳塔克邦和旁遮普邦。世界棉价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高峰，之后突然跌落。2000年初，有数千名不堪债务重负的棉农被逼上绝路，他们大多是吞服农药自杀的。²

这一系列惨痛灾难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不管因何种原因而起，都是强势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系统化政策抉择造成的意外后果。南部非洲的粮食危机突显了重债穷国被迫推行自由化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恶果。棉农的遭遇折射出了依赖不稳定的初级商品出口所带来的种种风险，因为这些商品的全球市场价格反复无常，可能出现价格暴跌或是持续降价。棉花只是其中的一种商品。到2001年末，非燃料商品的实际价格已经降至1978至1981年间年均价格的一半，导致非石油商品出

口国的外债不断增多，难以为继。³ 这样的危机还有很多。人们由此开始质疑，自由化作为一项普遍政策模式，是否适用于靠农业为生的农村人口比例很高的发展中国家。

欧洲和美国的农民享受保护和补贴，而南半球的农产品却被排斥在北半球市场之外，现行农产品贸易制度中的这些扭曲现象一直遭到南半球各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世界贸易组织内部进行着旷日持久的谈判，但这些矛盾依然悬而未决，农产品贸易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尚不明朗。⁴ 全球贸易制度中巨大的南北差异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农业领域的经济自由化给不同社会群体造成的不同后果，却往往被忽略。关于妇女和男子、女孩和男孩受到不同影响的性别观点被搁置在一边。

本章从性别观点出发，深入分析了农业自由化，重点是妇女相对于男子在收入机会、农作劳动、家庭责任、以及资源享用方面的变化。自由化加深了小农的脆弱程度，也加重了妇女的劳动负担，但没有产生预期的增长率，也没能得到能够促进生产、技术革新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刺激因素。此外，自由化进程动摇了社会关系，引发了性别关系方面的变化。

自由化对农村贫困状况的影响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农村人口比例依然很高，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至关重要（见表 6.1）。因此，选择这些地区进行农村贫困状况和妇女贫困状况研究。与此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拉丁美洲的城市化程度非常高，农业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相对较小。但农产品依然是重要的外汇来源，拉丁美洲种植高价值出口农产品的成功转型曾经得到国际金融机构的褒奖。这一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女性农业劳动者，因此其相关影响很值得探讨。

上世纪八十年代，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都发生了经济危机，据国际金融机构的判断，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各国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活动。农业部门被视为国家指导体制的主要受害者。例如，廉价的粮食政策扭曲了农产品价格，压低了农业收益。要是由市场决定价格，价格会自然提高，让生产者受益；另一方面，货币贬值和降低出口税有助于促进农业出口。这是国际公认的政策观点。⁵

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深深涉足经济领域。例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普遍认为，仅靠市场不足以建设强大的经济。各国纷纷成立了市场主管机构，负责管理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提供补贴，并且通常按照同样的价格收购偏远地区和城市市场周边地区的农产品。在拉丁美洲，过高的汇率和出口税人为地压低了农产品价格，但是又通过公共投资、补贴信贷和农业服务等方式向农业部门积极转移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压低价格的后果。⁶

在这段时期，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市场农产品产量出现了大幅度波动（见图6.1）。在拉丁美洲，七十年代的增长速度相当可观，年均增长率为3.3%。进入改革最初十年的八十年代，增长率普遍下降。在这段危机重重的时期，贫困比率普遍上升：总体家庭贫困率从41%提高到48%。九十年代的农业增长率平均只有2.2%。贫困指数有所

改善，但进展速度十分缓慢。因此，当新千年来临之际，拉丁美洲的农村贫困人口比例比1980年还要高（见表6.2）。与此同时，经济改革往往进一步加深了现有的区域及生产者之间的差距。⁷九十年代最有活力的产品，出自那些已经实现资本化并与国际农用工业和出口市场接轨的现代农民之手。拉丁美洲实行自由化的负面效应之一是增加了农产品进口。⁸

自由化政策对于农业的影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人口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一地区的农业早在推行自由化之前就已经陷入停滞不前，只是各国的停滞程度不太均衡。各种政府机构被视为罪魁祸首：这些机构耗费了政府财政收入，但在提供投入和付款问题上却效率低下。有人认为，以减少国家干预为特点的政策调整可以扭转非洲农业的不良发展趋势。

近30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增长率经历了大起大落（见图6.1）。无论增长率是高是低（有些年份为负增长），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从而冲淡了自由化改革的影响。常常被奉为成功改革典范的乌干达就是一个实例。乌干达的确实实现了高增长率，但在改革前的动荡年月里，国家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致使衡量绩效的基线非常之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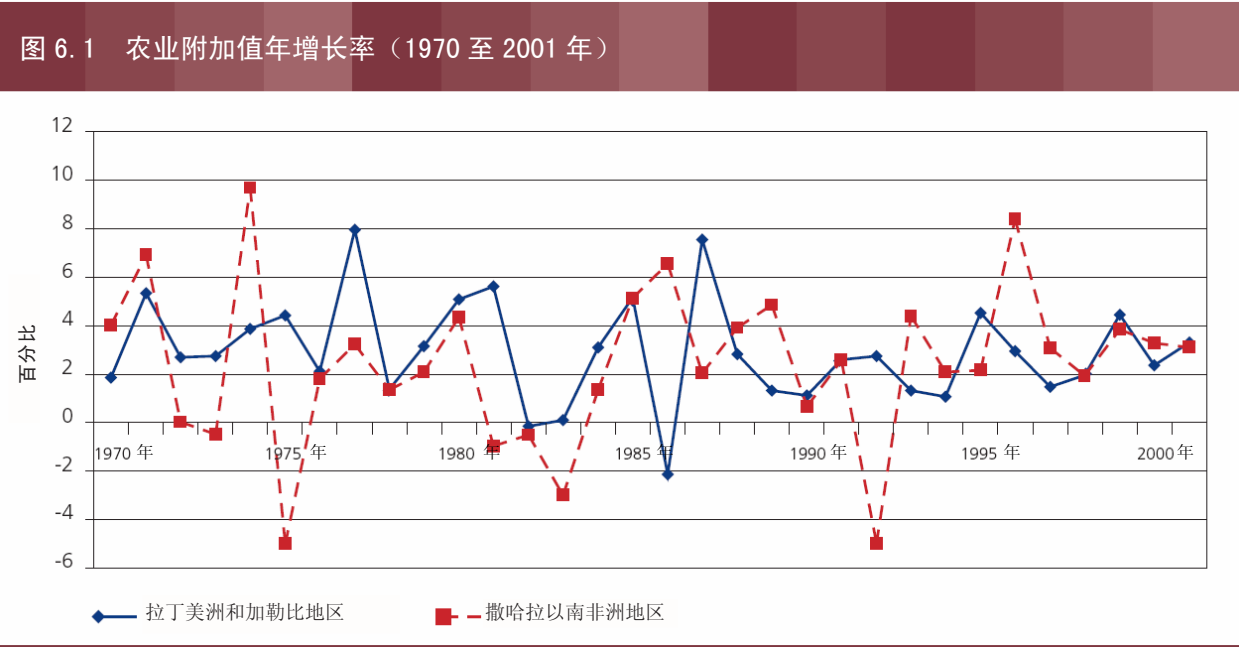
这些年来，改革的支持者日益认识到，自由化政策对于非洲农业的作用令人失望。⁹同小农相比，提高后的价格和新兴市场为大规模商业化农民和地产所有者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而小农在任何国家都属于大多数。在少数几个国家，对于某种特定商品来说，自由化的确对某些出口农作物的小农生产起到了刺激作用，但这些效用未能保持下来。正如图6.2所示，在推行自由化的八十年代和

表 6.1 农业经济活跃人口、农业附加值、农业出口的区域平均数及一些国家的实例（1980 至 2000 年）

	农业经济活跃人口比率 ⁽¹⁾			农业附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百分比) ⁽²⁾			农业出口 (占商品出口的百分比) ⁽²⁾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非洲	69	64	59	29	29	27	51	45	43
北非	44	32	27	15	16	13	16	15	11
埃及	57	41	34	18	19	17	22	19	—
突尼斯	39	28	25	14	16	12	8	12	9
撒哈拉以南非洲	72	68	63	31	30	28	59	55	52
喀麦隆	73	70	59	31	25	43	64	35	36
南非	17	14	10	6	5	3	11	12	12
坦桑尼亚	86	84	80	—	46	45	76	—	—
津巴布韦	72	68	63	16	16	18	43	51	6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31	25	21	16	14	10	47	47	44
加勒比地区	26	22	17	14	11	7	38	36	43
多米尼加共和国	32	25	17	20	13	11	73	—	—
牙买加	31	25	21	8	7	6	14	20	23
中美	42	34	27	22	19	13	65	68	57
危地马拉	54	52	46	25	26	23	70	73	60
墨西哥	36	28	21	9	8	4	15	13	5
尼加拉瓜	42	34	27	23	31	—	83	91	90
南美	31	25	21	13	14	12	42	39	36
阿根廷	13	12	10	6	8	5	71	61	45
巴西	37	23	17	11	8	7	50	31	28
巴拉圭	45	39	34	29	28	20	88	90	80
亚洲	46	41	36	21	23	23	28	15	11
东亚	49	40	33	15	13	13	5	6	3
中国	74	72	67	30	27	16	—	16	7
大韩民国	37	18	10	15	9	5	9	5	3
东南亚	56	52	48	21	29	25	31	17	9
印度尼西亚	58	55	48	24	20	17	22	16	13
泰国	71	64	56	23	13	10	58	34	18
南亚	67	61	57	40	33	27	48	23	19
印度	70	64	60	39	31	25	33	20	14
巴基斯坦	63	52	47	30	26	27	44	20	13
中亚	—	—	—	—	33	32	—	—	—
哈萨克斯坦	—	—	18	—	—	9	—	—	8
乌兹别克斯坦	—	—	28	—	33	34	—	—	—
西亚	26	20	15	9	14	17	19	12	12
约旦	18	15	11	8	8	2	25	11	1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39	33	28	20	28	23	13	18	13
大洋洲	48	43	37	27	21	19	70	71	43
发达地区	15	11	8	8	10	7	23	19	14
东欧	28	23	17	20	18	12	17	15	9
西欧	12	8	5	7	5	3	21	17	13
其他发达地区	7	5	4	6	4	2	34	27	22
全世界	43	38	34	20	20	18	39	32	29

注：每个变量的区域平均数根据至少有两个阶段资料可用的国家计算所得。农业出口包括粮食出口和农业原料出口。

资料来源：（1）根据FAO 2004计算；（2）World Bank, 2004b。



资料来源：根据World Bank 2004b计算。

表 6.2 拉丁美洲贫困人口和赤贫人口比例（1980 至 2002 年，百分比）

	贫困人口比例			赤贫人口比例		
年份	总计	城市	农村	总计	城市	农村
1980年	41	30	60	19	11	33
1990年	48	41	65	23	15	40
2000年	43	36	63	18	12	38
2002年	44	38	62	19	14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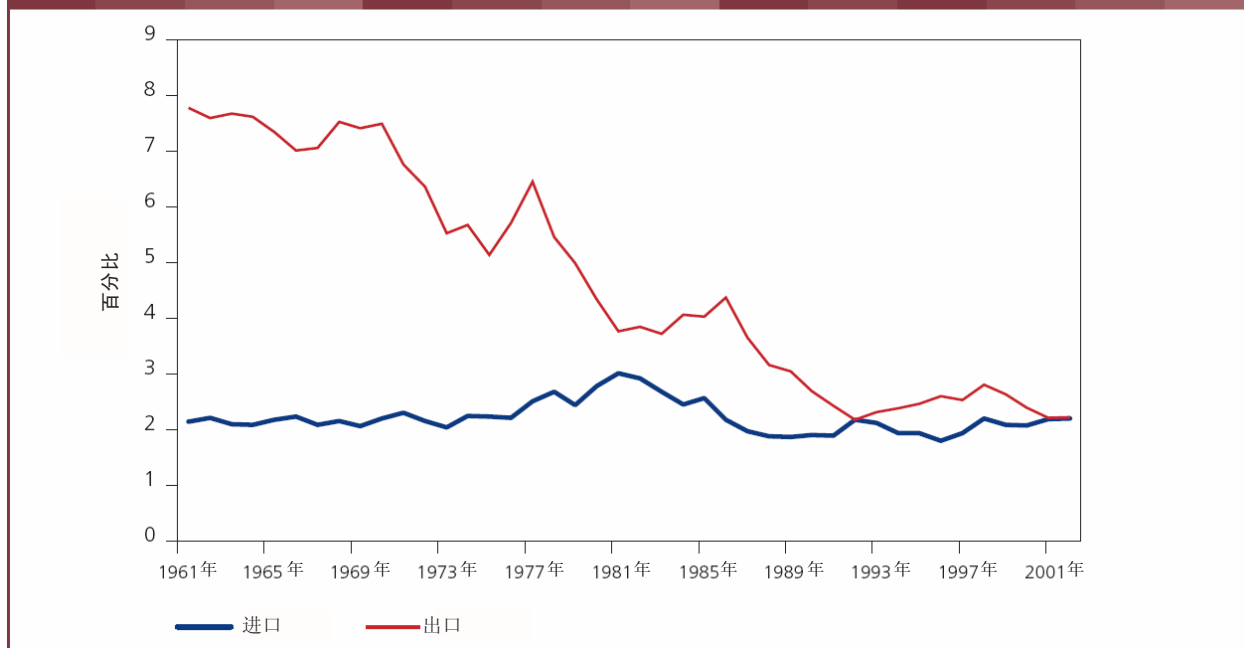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ECLAC，2004。

九十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出口在世界农业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¹⁰

与此同时，有关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正如上文所述，2002年南部非洲发生的粮食短缺揭示了日趋险恶的农村生活状况。由于失去了肥料和种子补贴，得不到农村贷款，以及农产品销售服务萎缩，马拉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家庭食物保障日益恶化，边远地区

的情况尤为严重。¹¹从前主管农产品销售工作的政府机构备受嘲笑，但这些部门毕竟曾经尽力满足小农对于政府投入的需求，为边远地区非常分散的农场提供销售渠道，并且推行商品标准。这些机构的撤销使得公众忧心忡忡。¹²取而代之的私营贸易商所提供的服务分布不均，对于运费高昂地区的农民往往弃之于不顾，并且不进行适当的检查，也不执行质量控制。¹³

图 6.2 撒哈拉以南非洲在世界农业贸易总额中所占百分比（1961 至 2002 年）



资料来源：根据FAO 2004计算。

经济改革的性别影响

从区分性别的角度来考察经济改革对于农村生活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就农村变化进行普遍性别分析的证据基础十分薄弱；某些国家提供的信息只能用于开展区域趋势分析，而这种趋势很难依据数量稀少且缺乏指示性的数据来推断。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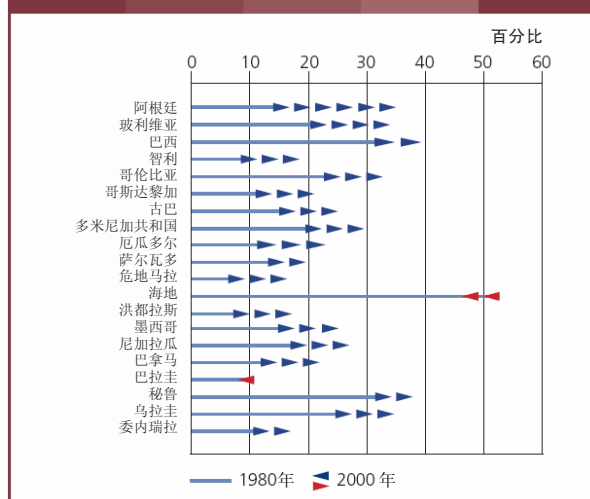
各国的农业统计数据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不够完备，其中有些数据以所有者个人作为分析单位，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评估家庭成员之间的农业劳作关系。国家农业统计数据中关于妇女自营耕作的信息少得可怜，这主要是由于收集数据的技术和方法所造成的。劳动力调查可以提供按性别分别的数据，但这方面的信息往往不可靠，甚至带有误导倾向。1980年至2000年间拉丁美洲妇女经济活动率的所谓增长，只不过是反映出了以往统

计工作的计数不足（见图6.3）。这就很难得出有关农村妇女就业情况的确切结论，特别是由于相关数据否定了女工集中在非农业部门的一切可能性。¹⁵

关于性别关系在自由化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的个案研究，不但数量稀少，而且彼此之间缺乏联系，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此类研究更是如此。在拉丁美洲，有一些关于有大量女工参与的高价值农产品出口生产的案例研究；但是在自由化对于传统商品小农生产的性别影响方面，相关资料就要少多了。

本章首先分析小农耕作情况。这种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基础，其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相互重合，一部分产品通常不进入市场领域，而是用于家庭消费。这种小农经济至今依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经济中的重要制度。

图 6.3 拉丁美洲农村妇女经济活动率(1980至 2000 年)



注：数据指年龄在 10 岁以上的人口群体。

资料来源：ECLAC，2002。

近二十年来，小农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接下来，本章将进一步探讨大规模出口型公司化农业经营当中的农村雇佣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已经成为农村妇女实现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特别在拉丁美洲，当地的社会经济分化程度极高，有相当多的无地和缺地家庭完全依靠工资维持生活。本章第三部分将全面分析小农生活的多样化，各种家庭成员——无论男女老少——越来越多地参与这种经济形式。在各种农村生活当中，无偿家务劳动和护理经济占据了核心位置。

隐性经济：无偿家务劳动

农村生活的核心是旨在管理家庭和满足家人需要的无偿家庭经济。在这种环境下，妇女发挥着多重作用。她们要协助种植家用粮食和蔬菜，饲养家畜，为家人做饭；劈柴、担水、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和病人等工作全部由妇女承担；此外，她们还时常从事非正规的经营活动，从中赚取一点儿现金，比如出售多余的园艺产品和酿酒。所

有这些活动既费时又费力，并且对家庭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生计研究偶尔会提及这些活动，但很少系统地收集有关妇女无偿劳动的数据。因此，很难查清自由化对于无偿劳动负担以及对健康和营养指标所产生的影响。后者在经过长时间沉积之后才会显现出来。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农村妇女每天用于担水、拾柴、做饭和照看孩子的时间平均在 3.5 小时到 5 小时之间。此外，她们还要和男子一起干农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加重了许多非洲妇女和少女的劳动负担，她们还要护理身体逐渐衰弱的艾滋病病人。女孩可能被迫辍学在家，承担家务劳动；老年妇女则要为已经去世的子女代为照料未成年孤儿。在医疗保健和社会基础设施极度匮乏的国家，照料病人的责任和家庭负担极其沉重。¹⁶ 因此，经济改革纲领提出的减少社会服务和收取使用费的建议加重了妇女的劳动负担，从而构成对妇女的歧视（见第八章）。

减少医疗保健和水、电、卫生等公用事业的公共补贴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的市场化也增加了妇女在时间和体能上的消耗。¹⁷ 获取燃料和用水更加费时，也更加费钱。关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干旱地区妇女使用自行车的调查发现，这种工具主要用于从很远的水源运输饮用水。¹⁸ 在技术适当的低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公共资金，并提供基本服务，可以抵消日益严重的不利影响；但这不是强调服务和公用事业私有化的政策纲领的主导方向。

可以说，家庭负担致使许多非洲妇女遭遇“时间饥荒”，限制了她们参加生产工作的可能性。¹⁹ 在能找到工作的情况下，其他妇女将大量时间用于从事报酬极低的工作。²⁰ 即便她们不像在南亚妇女那样在获取食物的问题上遭受严苛的性别歧视，但其身体状况也因为长时间从事消耗体能的

劳动和多次生育而普遍受到影响。²¹ 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的产妇死亡率很高,而且近年来呈上升趋势。²² 即便是看不出妇女照料家人的无偿家务劳动负担对于可以衡量的经济生产力产生任何直接影响,但妇女及其子女的健康和营养状况也倍受损害。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减轻妇女的无偿劳动负担,即便这种负担未必会限制她们花在所谓“生产”劳动方面的时间。

自由化背景下的小农经营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自由化和小农

坦桑尼亚针对自由化对农村地区的影响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其中包括有关性别差异的研究。这在其他国家是非常罕见的。坦桑尼亚独立后的农村发展政策的特点是提高小农收入,鼓励粮食作物、而非出口作物的生产。但事实证明,国家支持农业的成本太高,而且效率越来越低。农业生产滑坡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严重经济危机的诱因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经济复苏贷款以执行结构调整方案为条件,其中,农业部门的改革首当其冲。

从那时以来,有关方面针对自由化对于咖啡、棉花和腰果等特定农作物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研究。²³ 发现的问题包括:信贷体系的崩溃;小农投入的急剧减少;地方税制复杂,负担过重;以及世界农产品的价格波动。类似的制约因素对于整个地区的小农经济普遍产生影响,致使八十年代初自由化开始至今的农业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粮食作物生产未见增长,出口作物的发展也不均衡。

坦桑尼亚的市场变化包括腰果出口大量增加。小农竭尽所能脱离传统经济作物,转而种植腰果。这一转变的结果是利弊兼有。“援助行动”组织对农民和地区官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存

在一个“蜜月期”和一个危机时期,前者始于九十年代中期的市场改革,到2000年为止,在此期间的世界价格不断上涨,后者从2000年开始并持续至今。²⁴ 在“蜜月期”,小农生产者从腰果贸易自由化中得到不少实惠。在刚刚实行私有化的部门,买主之间竞争激烈,农产品的收购价不断上涨。腰果的种植面积扩大了,单位产量增加了,出口价格和生产者价格也提高了。但是到了2001年,危机突然袭来,世界市场价格大幅跌落。不仅如此,买方成立了卡特尔集团,借以压榨小生产者。

不断变化的时局对于男、女家庭生产者都产生了哪些影响?依照传统,男子拥有腰果树,妇女提供大部分劳动力。在“蜜月期”,妇女得到了比较优厚的报酬,还雇佣了临时帮工。但研究发现,妇女的收益少于男子,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男子控制着腰果的销售,由男子负责同买方谈判价格。因此,妇女基本上不知道出售腰果的数量和价格。此外还有迹象表明,在有钱可赚的时期,男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据妇女讲,随着生产者价格的上扬,离婚率也提高了。她们抱怨说,丈夫在腰果种植季节利用妻子的劳动力,季节一过就抛弃她们,另娶新妻。

尽管有这些事后抱怨,但妇女的确暂时受益于这一段好时光。她们对于“蜜月期”内的劳动负担加重没有表示异议,并享用着不断增加的家庭收入。在推行自由化的最初阶段,她们的日子比2001年之后要好得多。起初,她们的家庭有实力雇佣帮工来帮忙干农活,但后来就不可能了。有些妇女甚至连点灯用的少量石蜡都买不起,到了晚上只好摸黑过日子。

在莫桑比克开展的一项广泛研究深入探究了在腰果生产和加工过程中自由化所产生的性别影

响。²⁵ 研究证实，这种性别影响取决于男女之间在控制关键资源、农作物收入和劳动力投入方面的差异。妇女承担的额外工作负担没有产生性别冲突。更重要的是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及其对家庭福利的具体影响。自由化造成了实际收入的损失，增加了小农经营者面对强势贸易商和反复无常的全球市场的风险。这些个案研究表明，私营部门没有给小农提供完备的市场，而世界市场的开放更加重了小农的脆弱处境，其他国家的实例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个案说明，劳动负担的变化有可能加剧男女之间的矛盾。九十年代的流行观点认为，非洲农业对于自由化的“供给反应”不足，可能是由于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缺乏灵活性，以及妇女不愿意为丈夫控制的经济作物付出无偿劳动。这种观点尤其受到世界银行的欢迎。²⁶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夫妻之间确实存在家庭内部的性别制约因素和利益冲突，但这种矛盾被夸大了。小农家庭的夫妻之间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有大量证据表明，农业中的性别角色往往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假如自由化没能提高农业产量，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自由化本身加剧了钳制小农经营者的制约因素，而不是由于家庭内部性别角色和冲突所酿成的经济后果。性别冲突往往是自由化对于家庭和社会群体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性别冲突是经济弊端的一种症状，而非诱因。

拉丁美洲的自由化和农业家庭

近30年来，若干相互重叠的进程促使拉丁美洲小农经营者的劳动力性别划分出现了变化，有些人将这种趋势称为“农业女性化”。²⁷ 主要原因是出现了贫困的、被剥夺了土地的小农阶层，这一过程在六、七十年代迅猛发展，总的来说同男子沦为无地或少地劳动力关联。在世界各地随

着越来越多的妇女从事农业劳动，男性开始参与临时雇佣劳动，特别是充当季节性移徙工人。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小农经济的性别划分通常比较灵活。

在自由化时代，妇女参与农业劳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她们不再是“次要”劳动者。妇女正在成为农场的经营者，在男子外出寻找其他收入来源的时候，妇女成为家庭农业耕作的主要劳动力，并且承担了更多的职责。农业改革撤销了国家对于国内粮食生产的直接支持，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上述进程。此外，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商品市场不景气，咖啡等传统农产品的出口量下滑。由此可见，“农业女性化”现象同当今时代的小农生产缺乏生存能力有关。

自由化对于小农经营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小农此前能够得到的国家支持以及他们向市场提供基本粮食产品的能力。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自由化对于自给自足的生产者所造成的影响，还赶不上城乡劳动力市场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受不利影响最严重的是曾经受益于农村发展措施的中小生产商。国家支持的取消和外部自由化的发展进程是决定性因素。

这些因素在墨西哥表现得很明显。在1970至1982年间，历届墨西哥政府都奉行“粮食主权”政策，投资开展农村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建设，为小农提供信贷和技术扶持。1982年债务危机之后出台的稳定和调整政策，加之经济普遍开放和国家农业支持机构的撤销，对小农的获利能力产生了严重影响。在1994年开始执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又出现了新的压力，来自美国的玉米进口量骤增。这使得价格被压低，政府旨在维持农业收入的补贴措施就根本不够用。

墨西哥的“农业女性化”现象同八、九十年

代的男性长途迁徙现象的增加、特别是从农村地区向美国的迁徙现象的增加，有着直接关系。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在丈夫和儿子长期在外打工的情况下便成为农场经营者。中美洲也有类似的进程，中美洲各国政府逐步削减了对基本粮食生产的支持。²⁸ 有越来越多的男性通过长途迁徙谋求雇佣工作，因此，妇女往往要负责维持农业生产和保障家庭食物供给。这一地区女户主的比例较高，也是由于这个缘故。

印度的经验

印度农业的女性化过程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在1972/1973至1999/2000年间，印度农业工人的比例从84%下降到76%。这主要是因为男性完全退出了农业生产，而女工则基本上留了下来。从1987/1988年开始，妇女进入非农业部门的速度放缓了；自1991年开始实施经济改革规划以来，这种减速非常明显。²⁹ 多年来，印度全国农村妇女的就业情况十分稳定。1961年，近90%的农村妇女从事农业劳动；1994年，这个比例为86%，略有下降。随着男子逐步脱离农业劳动，转行从事其他职业，妇女在农村地区临时劳动力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因此，一些分析家断言，印度农村也出现了农业女性化进程。³⁰ 农业雇佣劳动力通常从事工作最艰苦、报酬最差、地位最低的田间劳作，但这种雇佣劳动的女性化不同于农场经营的女性化。³¹ 在印度，基本上没有证据表明妇女正在担当经营农场的责任。

农村生计的多样化

同时出现了两种重要的自由化发展趋势。最先出现、而且起到了最直接作用的是大规模公司化出口农业的增长，尤其是高价值园艺产品，比如花卉、水果和蔬菜。对全球许多地区的农村妇女来说，这是重要的新兴就业渠道。第二个趋势

是小农生计普遍实现了多样化，家庭成员不分男女老幼日益为此辛勤劳作。有两个重要的性别问题同上述这两种趋势有关：妇女希望看到的是哪种生计多样化策略，其效果如何？随着农业生活方式的新发展，农村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出现了哪些变化？

农业就业的新形式

对于印度农村妇女来说，公司化农业是一个相对较新、而且不断发展壮大的就业渠道。杂交棉花和马铃薯已经分别成为安得拉邦和旁遮普邦的新型公司化农业的支柱。农业经营单位之间的合并导致小农转让自己手中的土地，其利用的劳动力主要由妇女儿童构成，临时性强，而且极易受到伤害。³² 旁遮普邦的一项研究表明，在马铃薯生产过程中，女工占60%，而她们的工资仅相当于男工的60%到75%。

撒哈拉以南的一些非洲国家也种植高价值出口型农作物，主要在淡季供应欧洲市场。肯尼亚、乌干达、南非和津巴布韦正在努力扩大鲜切花卉和蔬菜的出口量，不过正如表6.3所示，相关劳工人数普遍不多。在这支新兴劳工大军中，妇女占有很高比例。

公司化农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于以妇女为主的临时劳动力的剥削，在拉丁美洲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长。在历史上，拉丁美洲的土地分配极端不平衡，为数众多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土地，只能靠雇佣劳动为生。八、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政策促成了公司化出口型农业起步所需的雇佣劳动力的增长。在种植这些农作物的田间劳动力当中，妇女占40%至60%，而包装车间中的劳工绝大多数都是妇女。³³

有几方面的因素破坏了这种新型就业方式对

表 6.3 高价值出口型农业生产的妇女就业情况

	雇用人数	性别构成 (女性所占百分比)	年龄 (年龄段或中位数)	就业状况
鲜切花卉				
肯尼亚	40 000 (+ 4 000至 5 000名小农)	75	20至34	季节工
乌干达	3 000	75至85	-	正式工
津巴布韦	27 000	79至87	-	季节工和正式工
哥伦比亚	70 000 (+ 50 000名包 装行业女工)	60至80	15至28	正式工和合同工
厄瓜多尔	30 000至50 000	50至70	16至29	正式工和合同工
水果				
南非	280 000	53	31	季节工、临时工和合同工
巴西	-	65	-	正式工
智利	336 739	45	30	临时工
蔬菜				
肯尼亚	20 000至32 000	66	18至29	临时工
危地马拉	18 000名小农	田间劳作33 包装100	-	-
墨西哥	120万	50至90	-	临时工和季节工

资料来源：根据Dolan和Sorby，2003改编。

于妇女生计所造成的积极影响。公司化农业的劳动力性别分割程度非常高，绝大多数妇女从事缺乏保障、工资较低、技能要求不高的活动，没有晋升的机会。工作往往是季节性的，工时很长，健康和安全条件很差，缺乏社会保障。³⁴ 未经适当培训以及在不配备防护服的情况下使用有毒添加剂，是威胁健康的重大隐患。此外可能还存在一些长期健康影响，只是尚未开展充分研究。³⁵ 在生产高价值出口型农作物的一些国家（包括南非、智利和阿根廷），使用男女合同工的情况明显增多，他们受雇于第三方承包商。这样做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有利于提高出口生产的灵活性，因为承包商可以将其劳工队伍从一个工作场地转

移到另一个工作场地。但是，合同工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就业福利，也没有社会保障，是极其脆弱的劳工群体。

不过，妇女的新机遇也引发了某些积极的社会变革。现在的年轻妇女在城乡移徙和家庭工作之外有了第三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经济自主权、自身流动自由以及选择配偶的权利。在竞争工作职位的过程中，年轻单身妇女往往比已婚有小孩的妇女更受欢迎，尤其是包装车间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对于人数日益增多的女户主来说也至关重要。已婚妇女增加了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增强了在家庭内部的谈判实力，从而在家庭决策

问题有了更多的筹码。可是，由于妇女试图对家庭决策施加更多的影响，加剧家庭矛盾。

妇女劳工没有就业保障，收入水平低，缺乏社会保障，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女工主动采取集体行动。在分散、孤立的季节工人当中培育劳工组织和社区组织，是一个重大挑战；不过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智利水果产业部门临时女工的做法（见方框6.1）。

生计多样化的性别影响

“收入多样化”是指务农家庭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以扩展谋生方法。近20年来，“收入多样化”现象在很多农村地区非常普遍，其中包括以寻找工作为目的的季节性迁徙，这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很多地区的农村生活长期以来所形

成的一个特点。由此可见，多样化并非新鲜事，但这种趋势日趋增强。关于多样化趋势对于相关人员以及整个农村经济是否有利，众说纷纭，形成了诸多思想流派。

决策者支持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趋势，他们强调指出，这表明农村经济和农村市场日趋“厚重”，可以包含更加广泛的各类活动，其中就有各种农村产业。加强涉及到农业的追溯和前瞻等种种联系，对于农村扶贫工作十分重要。然而，多样化创收所采取的某些形式，已经引起了焦虑和不安。一些分析家认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寻求非农业收入，表明人们在愈益加剧的经济压力下探索谋生之道。一些作者因此强调指出，多样化与贫困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某些非农业收入之所以能够提供脱贫的途径，要么是因为

方框 6.1 智利水果产业的临时女工

在日益扩大的智利水果出口部门当中，季节女工的比例很高，其中有不少人从事包装工作。包装车间的集体工作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此将工人组织起来。可是，智利的临时工仍然很分散，在组织长期集体活动方面困难重重。1998年，水果产业中只有1%的工人加入了工会。

工会会员如此之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昔日的军政府在水果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所采取的压制政策。即便是在民主政治时代，工会组织也不能代表临时工进行集体谈判。临时女工的许多需求——比如儿童保育设施（因为工作季节正赶上学校放假）、工作季节以外就业的问题、以及教育和培训，等等——都不能通过工会得到解决，所以工人不愿意参加工会。

妇女只好从其他方面寻找出路。她们可以提出诉求的渠道之一是在工作场所以外参加由教会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社区组织。同工会相比，这些社区组织有一个优势：可以满足季节女工的具体需求，在失业期间充当协调中心，将季节女工的工作需求同工作季节以外的各种社会自助项目联系起来。但是，社区行动有其局限性：缺乏协调，依靠外部资助，而这种资助自回归民主政治以来逐年减少。此外，社区组织也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扶助外来打工人员。

在工作场所范围内，临时女工采取自己的策略来改善工作条件。比如，她们自发举行罢工，要求加薪。女工们把这种停工叫做“袖手旁观”：利用加工产品极易腐烂的特性，临时女工只需袖手旁观，任凭水果变质，即可增加谈判筹码。成败的关键在于参加罢工人数的多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人和朋友组成的社会网络。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临时女工成份混杂，而且每到生产季节结束，女工的团结基础即告解体，要想开展团结一致的持久斗争，难度确实很大。

资料来源：Barrientos 等，1999；Barrientos 和 Barrientos，2002。

多样化本身带来了更多、更有保障的收入，要么是因为这些收入可以再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在其他情况下，由于收入实在太少，多样化过程实际上助长了贫困的恶性循环。³⁶

很少有研究从性别观点入手来分析收入多样化问题。在这方面有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涉及到在坦桑尼亚南部进行的四项村级研究。³⁷ 此次研究发现了如下四种趋势：其一，在农村收入方面，出现了脱离农业耕作、向多样化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多样化的主要方向是非农业部门，而不是农业部门；其二，新型移徙方式是当代各种多样化策略的重要因素；其三，收入的多样化并不能提供农业投资所需的积蓄，而是以小型交易为主，通常涉及从东南亚进口的廉价消费品、二手服装和进口食品等；最后一点，年轻人所得到的大多是低门槛、低回报的就业机会，因而收入很少；有少数年轻男子从事报酬较高的活动。

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发现。在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和巴西东北部进行的非农业就业及收入研究表明，同男子相比，妇女往往会从事生产力低、报酬低的非农业活动。³⁸ 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农村生计的一项深入定性研究也表明，妇女大多局限在人满为患的非正规经济部门，依靠低回报工作勉强为生。³⁹

贫困妇女的谋生办法是为小农或营利农场充当临时工，以现金或实物为报酬。现有的研究证据表明，此类工作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收入多样化的渠道之一，而且正在不断扩大。关于此类工作的工资及其对妇女自家农田耕作的影响，目前还不太清楚；不过，在马拉维有迹象表明，假如妇女被迫从事临时性计件农业劳动，情况就会很糟。⁴⁰ 据估计，妇女的日工资仅相当于男子日工资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从事这种临时性农

业劳动，是极端贫困的标志。可是，在乌干达、莫桑比克和南非等国开展的研究发现，雇佣劳动的收入高于自营职业。在南非，同小型农场或其他自营职业相比，就职于大型国有农场或农业综合企业的妇女的收入更加可靠，也更有保障。⁴¹

生计多样化的阴暗面

现实生活有其残酷的一面。针对津巴布韦女性劳动力市场的一项研究考察了一家蔗糖工厂，该厂雇用了3 400名正式员工和少数临时工，其中不乏女工。临时工的工资相对来说还不错，但他们属于季节工。影响总体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是工期，而每年工期长短不一。许多妇女境况悲惨，特别是在合同到期的时候。她们大多孤身一人外出打工，把孩子留在乡下，自己则常年居住在工厂附近。当工厂不需要女工的时候，她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出卖肉体。这些女工缺乏家庭和亲属的保护，其中一些女工同男子姘居，只为有个安身之地。⁴²

津巴布韦的这项研究揭示出，生活困境迫使一些原本不是性工作者的妇女偶尔从事性交易，以获得钱物。关于印度奥里萨邦女性性工作者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此项研究翔实地记录下了“游荡的性工作者”现象：已婚妇女在晚间进城挣外快，这种现象在节日前非常普遍。⁴³ 在上述这些情况中，性工作为妇女（和一些男子）偶尔从事的各种活动当中的一项，而不是一种专门职业。

正如上文所述，在印度农村劳动者当中，逐步脱离农业劳动的生计多样化活动大多由男子把持，但由此产生的性别影响多种多样，其中涉及到的流动性促使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见方框6.2）。在非农业活动中，主要增长部门是建筑业、运输业、仓储业、零售业、旅馆业和餐饮业，所有这些行业

都倾向于雇用男工。女性就业仍集中在农业部门，有时也包括城乡之间的季节性移徙。⁴⁴ 在某些地区以及某些社会群体当中，举家迁移是很正常的事。此类家庭大多没有土地，不识字，属于低等种姓，通常从事烧砖、建筑、鱼类加工、季节性农活等非技术工种；妇女只能从事最卑贱、而且报酬很低的工作。在这些情况下，性别关系没有受到扰动。⁴⁵ 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妇女还得为全家人做饭、担水、劈柴，而男子则可以放松休息。此外，男子作为户主，依然握有对妇女工资的控制权。

劳动力分割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低门槛、低回报的就业活动与较高门槛、较高回报的职业之间的细分。绝大多数妇女为生计所迫，集中在低门槛、低回报的就业活动中，这一点不难理解；有些男子同样处境窘迫，但也有些男子占据了高门槛、高回报的就业岗位。妇女从新的收入来源所获得的微薄报酬，助长了投资不足

的恶性循环。男子往往利用移徙打工或正式工薪就业所得，投资高价值农业或家庭企业，使其投入商业营销的产品越来越多。相比之下，妇女挣得足够的非农业收入以便将储蓄用于农业投资的可能性就小得多。⁴⁶

有一些例外情况，特别是在妇女主导农产品营销的西非地区。在加纳南部，妇女贸易商表现出色。同男子相比，妇女大多从事低门槛、低回报的贸易活动，但也有少数妇女从事大规模经营活动，甚至打入国际市场。在加纳，贸易自由化对于女性贸易商的影响之一就是竞争更加激烈了。需要有更多的资源和技能才能参与竞争，因此，处于劣势地位的贫困妇女往往敌不过规模较大的经营者。

凡有年轻移徙妇女在城市中寻求就业，就有机会实现经济流动，社会准则和习俗就可能发生显著变化。在中国和孟加拉国等国，雇用女工的制造产业近年来不断发展壮大（见第五章），大

方框 6.2 印度的生计多样化和家庭结构的演变

印度全国各地的婚姻习俗都发生了变化，其中有些变化同农村收入的多样化趋势有关。这些变化包括结婚年龄的提高，彩礼的加重和普遍，以及核心家庭化趋势。假如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家庭可以分裂为若干核心组成部分：当家庭成员不再务农，转而寻找其他就业机会时；当家庭成员分别外出打工时；以及，当家庭成员希望控制收入，不愿与更多的家人共同分享收入时。对于贫困家庭中的某些人而言，这或许是生存之道，也可能源于社会地位的升迁。

多子女、大家庭的存在理由之一是为农业家庭提供劳动力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核心家庭的出现和发展是土地所有权的削弱以及从务农转入非农业工作的生计多样化的产物。在生活比较富足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当中，核心家庭趋势还反映儿媳的如下愿望：逃避专横的婆婆及其对家务劳动的发号施令，避免婆媳之间相互争夺儿子/丈夫，以及掌握更多的家庭财务控制权。

妇女本身对这一趋势具有影响力，她们必然会认为这种趋势符合她们的利益，但亦有所失：在核心家庭中，妇女在家务劳动和照顾儿童方面很少能够得到帮助。自由化可以加速非农业生计多样化，使更多的人失去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自由化支持核心家庭的发展，而且这一进程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资料来源：Jackson 和 Rao，2004。

量农村青年妇女首次获得了工薪就业的机会。⁴⁷她们当中有不少人与家庭保持着联系，将积攒下来的钱用于土地投资、农业投入、购置房产，或是为职业培训付学费。已婚的移民工人花很多钱供子女上学，这是提升家庭社会地位的潜在途径。⁴⁸遗憾的是，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自由化的迅猛发展伴随着民族工业的崩溃，寻求新生活的农村移民工人因此找不到工作岗位。

妇女生计多样化的制约因素

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各种环境下的农村劳动力市场至今还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分割现象。有些原因是直接的，仅限于经济范畴，与市场准入成本（资本要求）以及求职者对于自身劳动力价值的认识有关。对妇女来说，典型的非农就业机会大多集中在启动成本极低的小型企业。

妇女之所以愿意接受远远低于男子的工资，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一些重要因素需要考虑：自身生产活动的收入可能很低，为了满足家庭的迫切需要，比如供养子女。对于因男性户主不能提供或不愿提供基本生存条件而外出寻找工作的众多妇女来说，在当地基本上找不到挣钱的机会。男性农民的地位较高，在获取土地和信贷方面享有较多的机会，因此，男子的进退余地相对较大，获得较高回报的机会也相对多一些。制约妇女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可以起到比经济因素还要重要的作用。在亚洲许多地区，只有社会地位最低的妇女才为别人的农场打工；而与此同时，信用、声誉和社会联系等因素却给男子保留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某些肥缺。

享用资源的机会：土地和信贷

性别和土地

经济改革和自由化的主要经验教训之一，是

农民的资源贫困阻碍他们利用新的机遇。土地依然是农村经济中一项至关重要的资产。⁴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许多国家推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国际捐助者参与了很多国家的土地改革规划工作，他们依据的观点是，建立“恰当的制度”（通过登记注册和颁发地契确认私有产权）可以强化市场，便利外资进入农业部门，促进总体发展。

许多国家的女权运动积极分子纷纷参与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政治讨论，农业工会、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也参与了进来。妇女要求掌握或拥有土地的主张引起了争论，这表明公民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有人谴责某些妇女个人或团体甘愿被国家或外国捐助者收买。不久前，坦桑尼亚就土地制度改革开展辩论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上述情况，并最终于1999年通过了两项具体立法。⁵⁰ 只有在女权运动积极分子在相关社会运动的内部及外部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之后，农村社会运动和工会才会支持妇女的土地权益，巴西的“无土地农工运动”和“全国农业劳工联合会”就是这方面的实例。⁵¹

在上述种种努力的感召下，各国在九十年代通过了多项更加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土地制度立法。拉丁美洲的民法改革逐步扩大了已婚妇女和同居妇女的财产权利。近十年来，随着各国农村妇女组织的兴起与巩固及其在实现妇女要求方面取得的成功，各国妇女还通过国家土地分配和登记方案获得了土地。⁵² 在印度，第九个五年计划（1997至2002年）特别注意到妇女和部落人口的土地权利问题，这两个群体在小农农业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高。⁵³

在历史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固有法或“习惯法”土地制度允许妇女拥有土地。可是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来，由于实行土地登记，确立

土地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妇女在土地问题上的地位下降了。正式土地所有权的分配往往会助长性别不平等，使得妇女更加缺乏保障：在土地登记过程中，妇女、游牧者和少数部落根据习惯法所享有的土地权利往往得不到承认。⁵⁴ 在谈及发放地契和土地登记过程损害妇女权益时，人们常常将肯尼亚的经验作为典型例证。坦桑尼亚、乌干达、马拉维、科特迪瓦、尼日尔、加纳、津巴布韦和南非等国近年来颁布的土地制度立法和土地所有权方案对于妇女的土地权益给予了更多的承认，但各国的进展程度不均衡。

即便在妇女的权利得到正式确认的情况下，在法律承认妇女有权拥有或掌握土地与妇女有效获取土地作为收入来源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

差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相当复杂，因地而异。但是，要让妇女、尤其是贫困妇女在有保障的基础上拥有土地，就需要注意两个重要的政策倾向：一是偏重于开发土地市场；二是政策再次关注地方非正规土地管理机制。

创建土地市场

要让妇女、尤其是贫困妇女在有保障的基础上拥有土地，就必须对现行政策中过分强调通过登记注册和发放地契创建土地市场的做法给予关注。对于资金不足、缺乏农作物改良和小农收入减少等问题来说，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各国都有证据表明，土地市场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十分不利，而且还会产生性别影响。表6.4反映出了拉丁美洲的情况。

表 6.4 按性别分列的土地所有权获取形式（百分比）

	继承	社区	国家	市场	其他	合计	
巴西							
妇女	54.2	-	0.6	37.4	7.8	100	n=4 345
男子	22.0	-	1.0	73.1	3.9	100	n=34 593
智利							
妇女	84.1	-	1.9	8.1	5.9	100	n=271
男子	65.4	-	2.7	25.1	6.8	100	n=411
厄瓜多尔							
妇女	42.5	-	5.0	44.9	7.6	100	n=497
男子	34.5	-	6.5	43.3	15.6	100	n=1 593
墨西哥							
妇女	81.1	1.8	5.3	8.1	3.7	100	n=512
男子	44.7	14.8	19.6	12.0	8.9	100	n=2 547
尼加拉瓜							
妇女	57.0	-	10.0	33.0	-	100	n=125
男子	32.0	-	16.0	52.0	-	100	n=656
秘鲁							
妇女	75.2	1.9	5.2	16.4	1.3	100	n=310
男子	48.7	6.3	12.4	26.6	6.0	100	n=1 512
配偶双方	37.3	1.6	7.7	52.6	0.8	100	n=247

资料来源：Deere和León, 2003:表3。

此外，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土地私有化影响证据的综合研究发现，近年来的私有化进程和土地集中（本质上不属于国有土地登记计划）削弱了妇女的土地权利。⁵⁵ 在上文提及的坦桑尼亚改革过程中，政府成立了“两性土地问题特别工作组”，一些女权主义者指出，妇女作为妻子所享有的土地权利得到了新的《农村地区法》的保护，但是她们作为社区成员所享有的土地权利却因为自由化原则和现行管理机制而受到威胁。⁵⁶

不过，并非所有的女权倡导者都对自由化抱有这种悲观态度。坦桑尼亚两性土地问题特别工作组中某些最具影响力的团体支持发放地契、土地登记和创建土地市场，因为这样一来，妇女就可以购置土地，以自己的名义将土地登记注册，由她们的后代来继承。但是，这种乐观主义似乎不合时宜，对于低收入妇女来说更是痴人说梦。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当前的发展趋势将使得贫困妇女等弱势群体丧失其曾经拥有的惯有权利；而有能力竞争土地这种重要资源的人则可以巩固其既得利益。

南非的土地改革在种族隔离的历史背景下推行，显得与众不同。在南非，改革遵循“愿买愿卖”的交易模式；由于在妇女土地权利问题上缺乏政治责任，以及制度缺陷和执行不利，对于性别平等的承诺基本上停留在形而上学的原则层面上。人们对于土地改革的关注重点是，国家是否有能力在遵循市场原则的框架内主动采取行动，大规模获取并重新分配可耕种土地。到2000年6月，全国平均土地转让率为1%，相对于需要和要求而言，这个比例少得可怜。严格意义上的需求驱动方案同争取妇女选民的政策宗旨相互抵触，因为前者忽视了社区内部的权力关系和权力划分如何影响人们提出“要求”的方式。⁵⁷ 迄今为止的主要成就是确保妇女同男子一道入选各种项目

委员会。但是，由于妇女在这种环境中往往难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妇女进入项目委员会任职并不能保证她们在项目规划过程中能够代表妇女的利益，也不能保证未来的妇女代表权。⁵⁸

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南非缺乏综合性土地政策，进一步限制了土地改革和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促进功效。由于存在这一政策空白，人们根本无从知道，获得一小块土地是否足以为体面的生活奠定基础。以印度为例，农业部门增长缓慢，公共投资减少，以及农村萧条的其他种种迹象，都是值得警醒的重要理由。承认妇女的土地所有权，或是为农村妇女提供培训和推广服务，是否真能带来变化，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回归地方非正规管理机制

近年来，作为权力下放和加强地方政府的部分内容，各国政策开始重新关注地方非正规的“习惯法”土地管理机制。⁵⁹ 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就这些地方系统的实际运作方法进行过谈论，比如地方管理机制能否以更加平等的方式分配资源。在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凡是涉及到土地所有权问题的任何决策层，妇女都没有任何权力；不仅在正规的行政和法律体制中是如此，在地方非正规决策中也是如此，而且尤以后者为甚。在南非和加纳等国，“传统”管理机构在农村地方政府中所享有的地位让人们深感忧虑，因为这些机构的权力并不总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他们所宣扬的“传统思想”可能会损害妇女利益。⁶⁰

在有些地区，关于土地的决策权已经下放到非正规社区机构，而乌干达在这方面甚至走得更远。这些地区的妇女会发现，地方管理机构的“司法”其实具有严重的歧视性。一位观察家说：“妇女公开质疑，在妇女嫁入男子家中的父系社会当中，由丈夫的亲戚朋友组成的地方管理机构能否

对她们这些局外人做出公正的裁决。”⁶¹ 中国的土地管理权力下放也引发了类似的关注。中央政府在做出任何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将权力转交给地方政府，结果导致地方政府的做法违背了旨在维护妇女土地权益的国家法律。⁶²

获得信贷的机会

资本制约因素对于男女农民都极为重要。所有的小农生产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本，就连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也需要种子和农具；经济作物——无论是粮食还是出口作物——所需要的花费就更多了。必要的资金总额往往超出妇女的经济能力，即便是在正常年景，她们手头的现金也少得可怜。

近十年来，扶贫政策十分重视小额信贷干预措施。根据《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的要求，各国常常将妇女确定为小额信贷机制的具体扶助对象。由于农村妇女无法独立获取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资源，小额信贷政策使得妇女受益无穷。

最活跃的小额信贷运动出现在南亚地区。自印度独立以来，以合理的利率提供充分、及时的贷款就是公共政策的明确目标之一。为此，相应扩大了正规放贷机构，同时通过《农村综合发展规划》和其他银行贷款渠道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优惠信贷或补贴信贷。可是，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方面的问题，对实施规划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缺乏认识。

银行业改革始于1991年，这一时期的多项改革进程均以自由化为目标。关于发放信贷的最新研究表明，在1985至2001年间，农业信贷在信贷发放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更重要的是，提供给边缘化农民的商业银行农业信贷比例，从1990年的30%跌落到1999至2000年间的24%。同期，通过《农村综合发展规划》获得贷款的人数

也从290万减少到130万。⁶³ 虽然没有得到按性别分列的数据，但是由于农业贷款需要以土地作为担保，而大多数妇女没有土地所有权，因此，发放给妇女的农业贷款可能微乎其微。⁶⁴

政府鼓励妇女成立“自助组”，希望借助这种方式迅速扩展小额信贷的发放范围，从而填补上述差距。成立自助组的目的是为了克服正规贷款机构的放贷机会有限、交易费过高和还贷率低等问题。小额信贷方案在1992年支持500个自助组，到2002年，已经发展到支持500 000个自助组，惠及4 000万人，其中90%是妇女。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⁶⁵

不过，在将信贷范围扩展到最贫困阶层妇女的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不足。由非政府组织负责为女性成员联系信贷机构的情况占到了70%。由此可见，活跃在小额融资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决定着农业信贷惠及潜在客户的扩展速度。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全国各地分布不均，通常集中在某些邦和地区。此外，印度全国各地的农村妇女普遍从事家畜饲养，但在1999至2000年针对农业及其相关活动的小额贷款总额中，仅有6%提供给了畜牧业和乳品业，这不能不令人失望。另一个问题是平均贷款额相对较低：自助组的成员通常只能拿到1 000卢比的贷款。这种低水平的贷款曾经多次使得一些妇女在创收项目中陷入资本不足的困境，从而无法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

关于安得拉邦妇女自助组的研究指出，将妇女组织起来的策略方向是对的，但这样做并不能自动促成社会准则和性别平等的改善。⁶⁶ 近几十年来，小额信贷在另一个南亚国家——孟加拉国蓬勃发展，从该国提供的相关证据来看，褒贬兼而有之。一些研究表明，在妇女获得信贷并控制了随之而来的收入和资产之后，妇女在家庭内部的谈判实力得到加强；而其他研究人员则指出，

贷款和还贷压力造成紧张的因素，导致家庭暴力升级。⁶⁷

探查性别关系的变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削弱了对国内农业的支持，全球商品市场极不稳定且普遍萧条，致使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小农家庭蒙受沉重打击。很少有研究人员针对这些社区和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开展专项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严峻的经济压力是造成家庭破裂、性别角色互换、以及资源控制权和男女关系转变的外部因素。在很多国家，为数众多的男子长期或季节性外出打工，农业家庭的全部责任都落在妇女肩上。假如自由化没能实现农业收入的持续提高，那么，家庭被迫调整生计，就有可能导致男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确有一些研究专门分析了一系列自由化进程给农村社会性别关系造成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及的坦桑尼亚的研究。⁶⁸“向钱看”现象促使古老的劳动力性别划分和代际划分发生了巨变。昔日的劳动力性别分工模式瓦解了，男人现在普遍同意让妻子和女儿外出打工。女人则经常谈论，是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迫使她们承担起赚钱养家的新角色。妇女所从事的创收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一些男子开始从事传统上分配给妇女的工作，比如酿造啤酒。随着进入市场的年龄和性别障碍逐步消失，是否拥有充足的资本利用可以产生高收益的非农业赚钱机会，已经成为一条日益明晰的分界线。

坦桑尼亚的研究还揭示了自由化对于性别关系和代际关系的深刻影响。男子似乎愿意默许妇女利用新的挣钱机会，但他们不愿意接受家庭关系结构的改变。妇女抱怨自己的日常工作负担加

重了；在妇女的现金收入同男子不相上下的社区，沮丧的丈夫会对妻子口出怨言，他们对于妻子通过做生意和酿酒赚取额外收入的做法心怀不满。据说，殴打妻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另一项研究深入探究了自由化进程给肯尼亚农村地区两座村庄的性别关系和粮食保障所造成的影响，其中涉及到重新谈判夫妻关系和家庭责任的种种困难。⁶⁹自由化损害了男子的收入和就业机会，而妇女则在农场内外找到了新的创收机会。因此，在收入控制权、决策权和尊重家庭的问题上爆发了两性冲突。家庭所承受的压力以及男子丧失了养家糊口者的角色地位，使得问题更加激化，家庭暴力行为也因此增多。由于妇女外出工作，她们照料家庭和子女的时间减少了，而她们在支出方面的选择引起男子的怀疑和猜忌。

以上是小农经济收益不断减少和长期以来农村家庭收入多样化趋势日益加强的基本状况，在这一进程中，劳动力和权力的性别划分和代际划分经历了重新组合。其结果不仅加剧了两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产生了新的个人自主空间，妇女顺应了这些新机遇。自由化的进程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在总体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重新谈判两性责任分工可能会导致男女之间的冲突，这也许是自由化带来的最普遍的后果。正如本章指出，尽管有些妇女在多样化进程中获得了较高的收入，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妇女来说，多样化与其说是脱贫之道，到不如说是生存之道。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男女家庭成员都依靠非农业收入维持生活，女性的机会可能更多一些；但是妇女的挣钱机会可能会引发两性矛盾，假如男子找不到工作，或是男子的农业收入每况愈下，男女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紧张。

注释

- 1 House of Commons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mmittee, 2003:15; Devereux, 2002。
- 2 Patnaik, 2003。
- 3 UNCTAD, 2002; Gore, 2003。
- 4 TWN, 2003; Raghavan, 2004。
- 5 World Bank, 1981。
- 6 关于拉丁美洲, 参见Spoor, 2002。
- 7 David et al., 2001。
- 8 Deere, 2004:表2, 根据《粮农组织统计》, 涵盖43个国家和地区。
- 9 World Bank, 1994:171。
- 10 Moyo, 2002。
- 11 Abalu and Hassin, 1999。
- 12 Bryceson, 1999a, 1999b; Deininger and Olinto, 2000; MAFF, 1999; Oxfam/IDS, 1999; Wold, 1997。
- 13 Bryceson, 2002。
- 14 关于统计学和方法论的问题, 拉丁美洲的情况见Deere 2004;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见Whitehead, 2004; 印度的情况见Jackson and Rao, 2004。
- 15 见Deere, 2004。
- 16 Msimang and Ambert , 2004 ; Mackintosh and Tibandebage, 2004; 关于泰国的老年妇女情况, 见Knodel et al., 2001。
- 17 Heyzer, 1996。
- 18 Rao, 1999。
- 19 关于赞比亚, 见Blackden, 1997; 关于肯尼亚, 见Dolan, 1997。
- 20 Whitehead, 2001。
- 21 Kabeer, 2003:155。
- 22 Galli and Funk, 1995; Bijlmakers et al., 1996。
- 23 Rweyemamu, 2003; Mung'ong'o, 2000; Sen, 2002; Bigsten et al., 2001; Ellis and Mdoe, 2002; Baffes, 2002a, 2002b。
- 24 Action Aid, 2004。
- 25 Kanji and Vijfhuizen, 2003。
- 26 Blackden and Bhanu, 1999; 关于经验文献的一篇重要评述, 见Whitehead, 2001。
- 27 Arizpe et al., 1989。
- 28 Chiriboga et al., 1996。
- 29 Agarwal, 2003。
- 30 Agarwal, 2003; da Corta and Venkateshwarlu, 1999。
- 31 Jackson, 2003。
- 32 Gill, 2001; da Corta and Venkateshwarlu, 1999。
- 33 关于拉丁美洲的广泛案例研究的评论, 见Deere, 2004。
- 34 Dolan, 1997; Oxfam/IDS, 1999; Dolan and Sorby, 2003。
- 35 Barrientos and Barrientos, 2002。
- 36 Ellis, 2000; Reardon, 1997。
- 37 Bryceson, 1999a, 1999b。
- 38 Lanjouw, 2001; Ferreira and Lanjouw, 2001; Elbers and Lanjouw, 2001。
- 39 Kandiyoti, 2003。
- 40 Whiteside, 2000。
- 41 Sender, 2002; Sender et al., 2004。
- 42 Adams, 1991, 转引自Whitehead, 2004。
- 43 Gangoli, 2003。
- 44 Breman, 1985; Teerink, 1995。
- 45 Mitra, 1989/90。
- 46 Moore and Vaughan, 1994。
- 47 Kabeer, 2000; Gulati, 1993。

- 48 Lee, 2004。
- 49 Agarwal, 1994。
- 50 Tsikata, 2003b。
- 51 Deere, 2003。
- 52 Deere, 2003。
- 53 Jackson and Rao, 2004。
- 54 Platteau, 1995。
- 55 Lastarria-Cornhiel, 1997。
- 56 Mbilinyi, 1999:5, 转引自Tsikata, 2003b。
- 57 Walker, 2003。
- 58 Walker, 2003。
- 59 Whitehead and Tsikata, 2003。
- 60 Tsikata, 2003a。
- 61 Khadiagala, 2001:67。
- 62 Zongmin, 2004。
- 63 Ramachandran and Swaminathan, 2004。
- 64 Jackson and Rao, 2004。
- 65 NABARD, 2004。
- 66 Deshmukh-Ranadive, 2003。
- 67 Schuler et al., 1996; Goetz and Sengupta, 1996。
- 68 Bryceson, 1999a, 1999b。
- 69 RODI-Kenya, 2004。